

入关前的农耕组织:拖克索

邱源媛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在八旗制度和旗人群体研究中, 农耕人群与社会一直是相对薄弱的领域。作为半渔猎、半农耕民族, 女真人对土地的态度与蒙古等游牧民族迥然有别。明代初年, 原散居于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许多女真人群逐渐南迁, 与明朝和朝鲜等农业地区的联系日益频繁密切, 农业耕种的比重明显增加。其中, 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 对其社会结构影响较大。满文史料记载了后金时期建州女真的农耕组织“拖克索” tokso“庄”, 显示出八旗系统中农业生产的产生缘脉。拖克索的某些特点直接决定了入关后皇庄、王庄、八旗官庄, 以及八旗农业生产和农耕人群的基本性质。回溯后金时期的拖克索, 对于认识入关后八旗庄园制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后金时期; 女真; 农耕组织; 拖克索; 八旗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873(2023)02-0108-10

八旗研究领域中, 军事机制和军事职能一直是学术界关注较多的方面。提到“八旗”, 人们脑海里也往往浮现职业军人的形象。王公贵族自不必说, 即便是普通八旗人丁, 也是生活于大清王朝恩养政策之下, 拿着朝廷钱粮不事农工, 甚至于提笼架鸟的特权阶层。所以, 以往的八旗研究更侧重于这一形象的人群。相比而言, 学界对八旗社会中农耕人群和农耕社会的考察较为薄弱。^①

中国历史上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涵盖了复杂而多变的族群, 拥有层次丰富的多元文化, 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社会面貌。以契丹(辽)、女真(金)、蒙古(元)、满洲(清)而论, 契丹与蒙古是较为纯粹的草原地区游牧族群, 而女真与满洲则是居住在湿润的森林、原野地带的半农耕、半渔猎族群。他们虽然被学界并行讨论, 却具有不尽相同的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由此产生的族群性格。^[1] 面对中原汉族农耕文化时, 他们势必表现出或吸纳或对抗的不同态度, 对土地的不同认知颇能反映北方族群的文化差异。

作为半渔猎、半农耕民族, 女真人对土地的态度与蒙古等游牧民族迥然有别。元代蒙古人初入中原, 依照游牧思维, 对农用耕地提出“汉人无补于国, 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2] 废田为牧的主张。反观清代, 朝廷却采取了不同的措施。顺治元年(1644年)八旗军队入关, 八旗各类人群随即在以北京城为圆

收稿日期: 2023-08-30

作者简介: 邱源媛(1977-), 女, 贵州贵阳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清史、满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 22&ZD224)

①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中国大陆史学界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问题意识下, 对庄园旗地作过比较集中的研究, 整理了一批旗地庄园的史料、档案, 推出诸多成果, 后学从中受益颇多。此外, 周藤吉之、王钟翰、韦庆远、赵令志等先生的研究也为庄园旗地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奠定了坚实基础。参见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年版), 周藤吉之《清朝入关前旗地的发展》(东京河出书房1944年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旗地》(中华书局1989年版), 王钟翰《清代旗地性质初探》(载王钟翰主编《满族史研究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杨学琛《清代旗地的性质及其变化》(载《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 赵令志《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等等。

心的畿辅地区,层层分布,拱卫京师。为满足皇室、王公与八旗人丁的生活需要,清廷在近京500里范围内实行大规模圈地,设立庄园,即“跑马占圈”。清廷将圈占的民地变为皇庄、王庄、八旗官庄等旗地庄园,依然作农耕之用^①。以圈占和投充而获得的“圈地”涵盖了77个州县,东起山海关,西至太行山,北自长城,南抵顺德府,号称“直省九府内,除广平、大名二府,远处京南,均有旗庄坐落,毋庸置疑外,其余七府所辖有旗庄坐落者,共计七十七州县,广袤二千余里”,以致直隶地区布满旗地官庄。^{[3]322}关于清初圈地数量的史料很多,具体数字不尽相同,大体15万余顷土地。^②顺天府各个州县圈地比率最高,基本能占到原民地80%以上,有的州县甚至达到100%。^[4]农耕人群和社会在八旗体系中占有不能忽略的位置。

清初统治者对土地的认识、理解与处理,源自女真人半渔猎、半农耕的生活形态,了解女真时期即有的农业形态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 tokso“拖克索”,对于认识入关后八旗庄园制度非常重要。可以说,拖克索的某些特点直接决定了入关后皇庄、王庄、八旗官庄,以及八旗农业生产和农耕人群的基本性质。八旗社会中的农业生产源于何时,农业生产组织的发展脉络,以及入关前已形成一定庄园规制的事实,是本文重点探讨的内容。

一、与八旗系统同步产生的农耕组织

明代初年,原散居于松花江、黑龙江地区的许多女真部落逐渐南迁,与明朝和朝鲜等农业地区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农业耕种的比重日益增加。女真各部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不平衡,农业在其经济中所占比重也有所不同,其中,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发展较快,对其社会结构影响也比较大。^[5]

朝鲜史料是目前留存最早的记录后金时期女真人农耕状况的史料,弥足珍贵。明朝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努尔哈赤崛起之初,到过建州女真佛阿拉——“旧老城”的朝鲜人申忠一,对女真人的屯田作出如此描述:

自此^③(夫乙家川)以西,至奴酋家,所经处,无野不耕。至于山上,亦多开垦。^④^{[6]10}

蔓遮^⑤胡人童流水农幕^⑥,起耕仅二十余日。^{[6]10}

胡家四十座。小酋^⑦农幕,双古^⑧掌治。马二十匹放野。^{[6]11}

曰弥川。烟台。胡家百余座。木柵。酋胡童多古,小酋农幕^⑨,山端陡起处设木柵,上排弓家十余处。^{[6]13}

粮餉,奴酋^⑩等各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

① 清初圈占的土地,除了用于农用耕地外,同时还广设八旗、王、贝勒牧马厂地。农用耕地占了很大的比率,此后部分牧马厂地变为耕地。

② 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四年(1644—1685年),清廷在40余年间共圈地153467.25顷,参见吴振械《养吉斋余录》“卷1”、吴振械《养吉斋丛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86页)。《石渠余纪》称清初近京府州县圈占土地达154,200顷,参见王庆云《石渠余纪》“卷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95页)。

③ 另见拙作《清代旗地的数量与分布考实》(载《满语研究》2020年第2期)所记,“夫乙家川。一、此距鸭绿江加乙轩洞,一日可到云”。此处“自此以西”,应指自夫乙家川以西。

④ 申忠一出使建州的时间是明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万历二十三年(1596年)正月初五日。

⑤ 蔓遮岭,今集安县西老岭山脉大板岭;一说新开岭。蔓遮川,今集安县西浑江支流新开河。

⑥ 童流水农幕,在今集安县台上东南约十里处。

⑦ “小酋”,指舒尔哈齐。小酋农幕,在今集安县西恒仁水库北端库内。恒仁水库,今辽宁省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境内,位于五女山(五女山城所在地)东南角下,属于浑江上游。

⑧ 双古,满语 songko。

⑨ 小酋农幕,今新宾县东旺清门附近。

⑩ “奴酋”,系指努尔哈齐。

置云。^{[6]25}

他还直接提到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兄弟以及童流水、童时罗波、童阿斗等酋长皆有“农幕”，并记下了这些农幕的位置，说明它们多在旧老城附近沿河流一带地方，“胡人皆逐水而居，故胡家多于川边，少于山谷”^{[6]25}。其中，还提到“奴酋”努尔哈赤的农幕，“奴酋农幕，王致掌之云”^{[6]13}。“王致川”，即应该是“王致所在的那个川”，内有女真人家40多个，努尔哈赤的“农幕”由王致掌管。^{[6]13}朝鲜人申忠一对后金国“农幕”的记载过于简略，无法推知它的组织形式。

同为朝鲜人，20年后（万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即1619—1620年）抵达后金的李民奭在记述建州见闻时亦提到“自奴酋及诸子下至卒胡，皆有奴婢（互相买卖）、农庄（将胡则多至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①[7]}李民奭与申忠一的记载互有详略，但都呈现出“农幕”“农庄”农庄作为一种特定的生产形式，在努尔哈赤崛起的同时甚至之前已存在于女真人中间。

对于女真社会的农业情况，同一时期的满文档案保存了更多信息。^②《满文老档》记载了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粮仓的建立。

ineku tere aniya, gurun de jekui alban gaici, gurun jobombi seme, emu nirui juwan haha duin ihan be tucibufi sula bade usin tarime deribuhe, tereci gurun de jekui alban gaijarakū ofi, gurun inu joborakū oho, jeku inu elgiyer(《原档》为 elgin)^③ oho, tereci jekui ku gidaha, terei onggolo jekui ku akū bihe.^{[9]27}同年，以若徵（误，当为征）国人粮赋，则国人受苦。遂令各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始于荒地耕种之。自是免徵国人粮赋，国人遂无忧苦。粮储转为丰足，于是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8]19}

努尔哈赤规定，为了能够解决粮食问题，同时免征粮赋，避免百姓受苦，每牛录出男丁10人、牛4头，开垦荒地，以便于粮储逐渐丰足，能够建造粮库。“此前从无粮库”与上文“因置其部，而临时取用，不于城中积置（粮饷）云”^{[6]443}相比，女真人的粮食生产能力逐渐提高。此处提到的开荒方式以八旗最基层的行政组织“牛录”为单位，也就是说，农耕活动此时已是八旗组织里面一项重要任务，跟同时期已有的围猎、采集等生活以及其他军事任务一样，皆由“牛录”承担。

《满文老档》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十二月的记载，对此问题叙述得更为清晰。

sure kundulen han i isabuha amba gurun be gemu neigen teksileme tolofi, ilan tanggū haha be emu niru arafi, niru de emu ejen sindafi, nirui ejen i fejile, juwe daise, duin janggin duin gašan bošokū be sindafi, ilan tanggū haha be duin janggin ubu sindame dende(《原档》为 dende) tatan banjibufi(《原档》为 banjibubi) ai ai weile weilecibe, ai yabure genere bade ocibe, duin tatan i niyalma idu bodome gese weileme, gese tucibume gese yabubuha, coohai uksin saca beri sirdan loho gida jangkū enggemu hadala ai ai jaka ehe oci, nirui ejen be wasibumbi, dasaha ai jaka gemu sain oci, coohai morin tarhūn oci, nirui ejen be geli wesibumbi seme, ai jaka be doigon i šajin šajilame, mujilen bahabume banjibuha, jursu hecen sahafi hecen i duka de akdun niyalma be sonjofi, jakūn amban be tucibufi, aba cooha de gamarakū hecen tuwakiyabume, gašan i aika jaka be tuwakiyabuha, gurun de(《原档》为 gurunde) jekui alban jafaci, gurun jobombi seme emu nirui juwan haha duin ihan be siden de(《原档》为 sidende) tucibufi, sula bade usin taribufi(《原档》为 taribubi), jeku ambula bahafi ku(《原档》为 kuo) gidafi(《原档》为 gidabi)^{[14]1册61}, tere ku i jeku be ejeme gaijara salame bure, juwan ninggun amban jakūn baksi be afabuha,^{[9]55} 聪睿恭敬汗将收集众多之国人，尽

①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二月，李民奭随朝鲜元师姜弘立率军助明攻打后金。三月，朝鲜兵在富察战败，全军投降，李民奭被俘，直到翌年（1620年）七月释放回国，在后金境内生活了17个月，他对这段经历做了详细记载。

② 满文史料以《满文原档》（台北故宫博物院2006年版）和《满文老档》为据。《满文老档》已有较为成熟的汉译本，故直接采用其满文和汉译，并对所据每一条满文史料，皆溯及《满文原档》加以对比。二者差异之处，随文加注，以便查看。文内加注时，《满文原档》简称《原档》。

③ 参见《满文原档》第1册第29页。另外，本段落的末句 tereci jekui ku gidaha, terei onggolo jekui ku akū bihe，明显是之后补充上去的，具体何时、因何而补充，有待进一步考证。

行清点 均匀排列(笔者注: 此句应翻译为“整理清点, 令其(皆为) 平等”) , 每三百丁编一牛录, 牛录设额真一人, 牛录额真下设代子二人、章京四人、村拨什库四人。将三百男丁以四章京之份编为塔坦。无论做什么事、去何地, 四塔坦人按班轮值, 其同工、同差、同行走。军用盔甲、弓箭、腰刀、枪、长柄大刀、鞍辔等物若有损坏, 则贬谪其牛录额真。倘一应物件修治完好, 军马肥壮, 则晋升其牛录额真。为此, 凡事预先立法, 乃以示遵循。城筑二层, 选可信者守门, 所派之八大臣不出猎行兵, 专事守城及照管村中之一应物件。又念国人苦于粮赋, 特令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 以充公役, 垦荒屯田。自是 粮谷丰登, 修建粮库并委大臣十六名、巴克什八人, 以掌记录库粮、收发赈济事宜。^{[8]36}

这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 年) 史料的主体意思基本相同。这段较为完整的史料, 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政策背景及其反映的意义。

这段史料前半部分所述牛录组织的组成结构之事实, 常被研究者用来讨论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 八旗制度的重建与最后的确定问题。目前, 关于八旗的建立过程,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 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 , 努尔哈赤建黄、白、红、蓝四旗, 而后连年用兵, 征服了乌苏里江、黑龙江中下游, 以及东海女真的瓦尔喀、虎尔哈以及海西诸部。至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 , 除依恃明朝的叶赫部外, 努尔哈赤兼并了其他女真部落, 所管辖区域与统治人口极速膨胀, 万历四十三年(1615 年) 增四镶旗, 成八旗(八固山) 定制。第二年元旦, 努尔哈赤建立了后金, 开启了天命元年(1616 年) 。^①

在建立“金国”这一历史性变革的前夜, 努尔哈赤对牛录组织进行了再一次改造,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刘小萌指出, 《满洲实录》卷 3 记录了在牛录组织基础上按五进位原则编设牛录, 五牛录立一甲喇, 五甲喇立一固山, 即有关牛录组织发展为八旗组织的内容, 但关于牛录的内部变化却付诸阙如。^② 而《满文老档》中的这一条史料, 虽缺少八旗组织肇建的资料, 却载录了《满洲实录》所遗漏的内容。^{[8]128} 上文所引用史料, 正是《满文老档》关于牛录组织的重要内容, 涉及到多个八旗制度、八旗社会最重要的基层行政结构和行政事务。譬如, 300 人编为 1 牛录, 设牛录额真(nirui ejen) 管理; 额真之下设代子(daise) 2 人, “代子”(daise^③) 出自汉语借词, 义为“署理、署事”, 辅佐牛录额真的官员^④; 设章京(janggin) ^⑤4 人; 设噶珊拨什库(gašan bošokū) 村领催、村拨什库 或者守堡 4 人。章京分统四塔坦。“塔坦”具有“在野外之临时休憩处所”的意思^⑥, 每牛录下设四塔坦, 使之成为行军、农作、渔猎、采集、贸易等生产、生活的基层单位。^⑦

牛录制度是八旗构成最核心的基础。这一问题, 涉及牛录作为基层社会组织与权力机构的各项职

① 关于八旗制度建立的研究, 参见姚念慈《满族八旗制国家初探》(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6 年版, 此书后被编入姚念慈《清初政治史探微·前编》,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8 年版) ;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

② 《满洲实录》记载: tere aniya manju gurun i taidzu sure beile, ini isabuha gurun be dasame ilan tanggū haha be emu niru obufi, niru tome ejen sindaha. 汉译: 是年, 太祖将所聚之众, 每三百人内立一牛录额真管属。(《清实录》第 1 册第 117 页, 《满洲实录》卷 3, 己亥岁至癸丑岁[万历二十七年至四十一年], 中华书局 1986 年影印版。后不赘述)

③ daise 词义无考。今引用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赵令志《试论清代满族社会基层组织之变化》的有关解释。根据现存史料, daise 应该是入关前使用的职官名, 此后八旗制度越加成熟、规范, daise 不见于入关后的八旗组织当中, 但其动词形式 daiselambi“代理、署理”延续使用。

④ 后来, 牛录额真的“副手”改为骁骑校。但代子与骁骑校之间的关系待考。

⑤ janggin, 官名, 汉译“章京”, 指文武有责任执掌之有司官, 天聪八年(1634 年) , 改梅勒额真以下各官额真者为章京, 甲喇额真为甲喇章京, 牛录额真为牛录章京。

⑥ tatan 被《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殿刻本, 后不赘述) 列入 monggo boo maikan i haci 中, 即“毡房账房类”, 释为 bigan de yabure niyalmai iliha ebuhe babe tatan sembi“在野外行走之人歇息处称作 tatan”。参见赵令志《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

⑦ 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第二章“从部落到国家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第 128 页) ; 赵令志《试论清代满族社会基层组织之变化》(载《民族史研究》年刊, 1999 年) ; 赵令志《明末女真卫所衰落与建州女真的崛起——以穆昆塔坦档所载敕书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22 年第 2 期) 。

能标识牛录基层官吏较早的具体分工。在这段史料中,还有不少与农业相关的内容,其中,最为直接、以往却有所忽视的正是噶栅拨什库(gašan bošokū)。我们还需要重新解读“牛录”这一关键性的词汇。niru“牛录”,入关后通称为“佐领”。回溯女真时期,女真语音译为“你鲁”^{[9]145}。它的本义为“大箭”,是狩猎生产的重要工具。^①此后,“牛录”逐渐发展出派生义,指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10人围猎群体。^②以目前的史料来看,“牛录”成为一级组织,始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

tere aniya manju gurun i taidzu sure beile, ini isabuha gurun be dasame ilan tanggū haha be emu niru obufi, niru tome ejen sindaha.(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内立一牛录额真管属)。^③

至此,牛录由此前部落时代出兵行围时在族寨范围内自愿结合的临时性组织,转变为军事、政治、社会一体的常设性组织。牛录额真(nirui ejen)亦由临时选任变为稳定的职官名称。

bošokū“拨什库”汉译名“领催”,官名;gašan,义为“乡村、村、屯”,所以,gašan bošokū(噶栅拨什库)是主管庄屯之事的官员,管理在村落生产生活的旗人事务。女真社会中管理庄屯、村落事务的官员在牛录制度建立之初已经出现,与代子(后来的骁骑校)、章京等同等重要。这一事实康熙《御制清文鉴》中也有明确体现。“niru(牛录)”词条列于在《御制清文鉴》第二卷“hafan sindara šošohun(设官部)”“duin hacin(四类) duin meyen(四则)”“gūsa nirui hacin(固山牛录类)”,内容如下:

niru tanggū haha be acabufi banjibuhange be, niru sembi: niru de nirui janggin. funde bošokū juwan i da gabsihiyan bayara bošokū moringga uksin yafahan uksin baitangga bi.

自译:牛录,由三百男丁编成,所谓牛录,由牛录章京、骁骑校、护军校、前锋、护军、拨什库、马甲、步兵、拜唐阿组成。

显然,拨什库与牛录(或者说佐领)之下的其他职能成员并行存在。拨什库主要指八旗军队、衙署的低级官员,司文书、饷粮等事务,不同类型的拨什库有不同的职责。bošokū也会与不同的满语词汇搭配, funde bošokū即为骁骑校,八旗佐领下设骁骑校,辅助佐领管理属部。管理庄屯旗地事务是拨什库的职责之一,满文 gašan bošokū(噶栅拨什库)、tokso i bošokū/toksoi bošokū(庄拨什库)、tokso be kadalara bošokū(官庄拨什库,管理庄田的小官)的固定搭配,直接体现出此种职能性质^④。

gašan一词更为关键。此前,谈到八旗的农业,大都追溯到拖克索 tokso(农庄、庄),实际上,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及之前的史料中并未出现 tokso 一词,其时,农耕事务多与 gašan 直接相关。《御制清文鉴》将 gašan 解释为 yaya hoton hecen i tulergi falga falga tehengge be, gašan sembi,即“凡城堡外围若干法尔噶构成的居所称噶栅”^⑤,gašan 指城堡外面的居住点。在《满文老档》中,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之后,还多处出现 gašan tokso 组合的连用。我们将 gašan 理解为与当时的农业生产密切联系的组织,认定 gašan bošokū(噶栅拨什库)管理的对象是努尔哈赤初期、申忠一笔下的农幕,即后来出现的 tokso。这是应该吻合实情的。该社会群落,与我们关注较多的围猎、采集等人群早已同时存在于八旗形成之前的女真社会之中。后金天命元年(1616年)之后,随着人群扩大、农田增多,出现了制度化的 tokso,才能较为清晰地与普通意义上的 gašan 区别,而后在八旗体制中进一步完善,最终形成定制。

入关后,拨什库(bošokū)对庄园旗地的管理职能更为清晰,“旗下庄屯,向不属州县管辖,本旗统领

① 《御制清文鉴》称:niru, kacilan ci amba ningge be niru sembi, gurgu gaptara de baitalambi,自译“牛录,比把箭大者,谓牛录,射兽时用”。

② 参见《满洲实录》卷3“前此,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华言大箭)厄真(华言主也)。”

③ 参见《满洲实录》卷3,《武皇帝实录》也有同条记载“是年,太祖将所聚之众,每三百人立一牛录厄真管理”(《武皇帝实录》卷2,潘喆、李鸿彬、孙方明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第32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④ 参见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tokso 词条(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4页)。

⑤ 关于 gašan、falga 等词,刘小萌曾从血缘和地缘等角度做过讨论。参见刘小萌《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41、42、43页)。

官远在京城,仅有拨什库在屯,未能约束”^{[10]13}。“拨什库”一词常见于清初文献中,后正式改为汉文“领催”。庄园旗地的人丁户籍、土地地亩、缴纳钱粮、诉讼纠纷等等,几乎所有事务都由领催协调管理。日本“满铁”《中国农村惯行调查》频繁出现“催头”一词,以该书的记载来看,“催头”并不是庄头。笔者判断,“催头”很可能是当时民间对管理庄园事务之领催的称呼。

相似的情况,在蒙古社会中也有反映。蒙古语 *bošoyo*,即满语的 *bošokū*。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朝对苏木^①组织有明确规定,“蒙古每百五十丁编为佐领,设佐领一人,骁骑校一人,领催六名,马甲五十名”^②。作为蒙旗社会的基层小吏,他们掌管户籍、承办差役、管理草厂、调解纠纷,向下直接对接普通百姓,向上沟通蒙旗、道厅各级官员。^③在蒙旗的乡村社会、农耕事务中,他们也担任一定管理职能。契约、碑刻等民间文献中,经常写作汉文“保什号”“保什户”“保食户”,等同于八旗“拨什库”(领催),经常出现在蒙旗乡村社会的土地交易、水源利用、解决纠纷事务中。^④

建立粮仓一事至迟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努尔哈赤确定规制, *emu nirui juwan haha duin ihan be tucibufi sula bade usin tarime deribuhe*,各牛录出男丁10人、牛4头,开垦荒地,以发展农业,储备粮食,也由此得以建立粮库。史料特意提到 *terei onggolo jekui ku akū bihe*“此前从无粮库”,说明努尔哈赤对农业的重视程度,以及农业在女真社会中的迅速发展。万历四十三年(1613年)又重申每牛录出男丁10人、牛4头, *emu nirui juwan haha duin ihan be siden de tucibufi, sula bade usin taribufi, jeku ambula bahafi ku gidafi*“[努尔哈赤]特令一牛录出男丁十人,牛四头,以充公役,垦荒屯田”,这基本上成为一种定制,在努尔哈赤的女真社会中实行。

显然,农业基层组织制定与正式建立八旗制度是同一道谕令。从整条史料的逻辑来看,统计丁男,编设牛录,增置代子、章京、噶栅、拨什库诸职,又设立16位昂邦、8位巴克什,凡此举措,均与发展农业的战略息息相关。牛录不仅仅是军事组织;置于女真的农业系统中,安还是一个农业屯田的组织。组织农耕,计丁授田,同样是牛录的重要职能。换言之,八旗农业系统(逐渐形成庄园旗地)与八旗制度建立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在八旗制度,尤其是牛录制度建立的同时即有农业生产、生活和管理模式的雏形,庄园旗地模式从八旗建立之初已经呈现在制度体系范围之内,并在八旗制度形成过程中逐渐完善。

二、tokso“拖克索”的出现

与农耕组织直接对应的满文词汇是“tokso”,汉译“庄”,汉语文献中通常写作“拖克索”。《御制清文鉴》将 tokso 一词释为:

tokso, usin weilebule niyalma tebuhe babe, tokso sembi. jai tokso tuli seme holbofi gisurembi. gašan tokso de genere be, toksorome genehe.

自译:拖克索,耕作人居住之处,谓“拖克索”,连接起来谓之“庄园”。去往村庄谓之“下屯子去”。

① 蒙古语苏木 *sumu* 与满语牛录 *niru* 相似。

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976“理藩院·设官”。

③ 田宓《土默特的领催——清代蒙旗社会的基层小吏》待刊稿。

④ 2019年7月,笔者等人共同在内蒙古土默特平原考察。田宓老师带我们参观她的田野点——萨拉齐县城西侧的板申气村。其西北方向的脑包庙坐落在大青山的半山坡上,东侧为脑包沟。庙里供奉四海龙王,进门右边有乾隆四十年(1775年)石碑《板申齐新修庙宇碑记》一通,由板申齐村民为纪念脑包沟神泉灌溉之功所立,碑阳、碑阴均有文字,碑阴为捐资名单,碑阳记载了建庙始末。捐建者“丰恒号”“元兴永”均是来自山西的票号,刻工石匠也言明是山西人。建庙本意确为农业所需,碑记内有一词“保什号”,下面列有老赞、赞打什、必力免3个蒙古语人名。此三人为保什号。这块碑文反映了“保什号”(领催)在“蒙旗”农业社会中的真实存在与介入。关于苏木的研究,尤其是保什号/保什户(领催)在“蒙旗”农业村落社会中的具体制度及其作用等问题,可参见内蒙古大学呼和木其尔、云南大学田宓相关研究。

笔者统计,《满文老档》对 tokso(拖克索)的记载共有 67 处,其中,仅丁未年(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 年)五月以地名 fenehe tokso“佛讷赫拖克索”出现时,与本文所论农耕无关。

作为组织形态的 tokso,在《满文老档》中首次出现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四月十四日。

kubuhe suwayan i gūsai ejen adun gajime jifi han de acabure de, han morin ci ebubuhekū, ishun gala tukiyeme acaha, tere hecen i niyalma, ini afara de wabuhangge wabuha, hecen baha manggi, ume wara seme gemu ujihe, fusi, dung jeo, magendan ilan hecen, buya pu, tai, tokso uhereme sunja tanggū funceme gai fi.^{[9]92[14]1册173}(天命三年夏四月,驻守抚顺的李永芳不战而降。李永芳)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引之见汗(笔者注:努尔哈赤)。汗未令下马,举手相见。传谕曰“城中之人,攻城时战死者,任其死,克城后,勿杀。”皆抚养之。于是攻取抚顺和东州、玛根丹三城及小堡、台、屯,共五百余。各营于所至之地,汗归驻抚顺城。^{[8]57}

这条史料中, tokso“拖克索”与 buya pu“小堡”、tai“台”并列出现。pu、tai 为汉语音译词,pu“堡”在《满文老档》中对应明代在辽东设立的驿站,如 jeng dung pu“镇东堡”、jeng i pu“镇夷堡”等。tai 可能是“台”,日本东洋文库也译为“台”。从此层意义来说,《说文解字》“台”释为“观四方而高者”,古汉语有台门(古代诸侯所筑用来守望的土堆高台)、台城(古代守城拒敌的设备)等用法。由此理解, tokso 与 pu、tai 相似,是一种有固定地点的机构。^①该条史料中的 tokso 在汉译本中被翻译为“屯”,日本东洋文库译注《满文老档》时翻译为“庄”。从事件发生的前后时代,以及《满文老档》上下文来看, tokso 此时与农耕组织有关是可信的。但 tokso 并未同 pu、tai 一样直接源出汉语,这说明 tokso 组织并非全然脱胎于汉人社会,而是女真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当然,这与农耕文化受到汉人、朝鲜人的影响并不矛盾。

天命六年(1621 年)是 tokso 发展的重要节点。该年三月,努尔哈赤攻克明代辽东重镇辽阳、沈阳,占据辽东地区,如何安置八旗官兵,解决生计,保持八旗战斗力成为后金政权的首要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 年)七月十四日下谕颁布“计丁授田”令,^②关于 tokso 的记载随之在当年的《满文老档》中明显增加,共有 14 条。然而,包括此 14 条在内,直到天命八年(1623 年)之前,《满文老档》出现 28 次的 tokso,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某某人的庄”,如 han i tokso(汗庄)、adu i tokso(阿都庄)、jasitan i tokso(扎西坦庄)、sunja i tokso(孙札庄)等;一种是庄屯的通称。择例如下。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 年)八月十三日:

jase ci orin ba i dube ci, goroki jeku be tū seme, beisei tokso booi jakūn tanggū niyalma^③ de, narin, yendei gebungge juwe amban be ejen arafi hendume.^{[9]92[14]1册95}著纳林、殷德依^④二大臣为主,率诸贝勒之庄丁家人八百名至距边二十里处打谷。^{[8]66}

再如,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1621):

kuwan diyar(《满文原档》为 funghowang,即凤凰) i iogi sini harangga pu tun tokso i niyalma be, si šeo pu sebe gai fi bargiyafi gurire bade gamame gene.^{[9]412[14]2册243}著宽甸游击尔率守堡著将尔所属之堡屯庄民,带往应迁之地。^{[8]254}

明确涉及农业组织或者农业耕种的内容极少。直到天命八年(1623 年)七月十五日,才见到具有一定关联度的史料。

① 邢新欣《清代的王庄》详细分析了这条史料,参见邢新欣博士学位论文《清代的王庄》第一章第一节,2011 年。

② 《满文老档》第 24 册,天命六年(1621 年)七月,汉译本第 219 页。关于这条谕令,王锺翰、刘小萌、赵令志等学者都作过讨论,在此不一一例举。

③ 《满文原档》(第 1 册,第 95 页)笔迹不清晰,可能是 yafahan,并非 niyalma。

④ 纳林和殷德依都是当时的五牛录额真。

ineku tere inenggi , jakūn beise i ihan i adun i niyalma be usin be manabuha seme gūsita šusihā šusihalaha , jai jakūn beise i tokso i jangturi be usin de mukšan jafafi ainu ilihakū seme dehite šusihā šusihalaha , coohai niyalmai morin be usin de dosika be saha sahai jafa seme hūlahā.^{[10]851[14]4册88}是日,八贝勒之牧牛人,因践损田地,各鞭三十。又,八贝勒之庄头,以持棍在田,为何不加制止?各鞭四十。并布告曰“凡军士之马匹有入田者,一经发现,即捕之。”^{[8]548}

这条史料直接与农耕相关,还出现了 tokso i jangturi “拖克索的庄头”。jangturi 可能不是满语,而是汉语“庄”的译音,这是“庄头”一词首次出现在《满文老档》之中。可惜,这段史料不涉及庄头的作用和性质、庄园的规定等项内容。

天命九年(1624年)两则史料出现了 jušen tokso “诸申庄”与 nikan^① tokso “汉人庄”的分类。

efu gege de bure be henduhengge , nadata hahai jušen tokso juwe , nikan tokso juwe^{[10]886}赏赐额驸、格格:各有七名男丁之诸申庄二,汉人庄二。^{[8]573}

enggeder efu , manggūldai de nadata hahai jušen tokso juwete , juwanta hahai nikan tokso juwete , gala hanci takūrabure jušen sunjata juru , muke ganara moo sacire sunjata juru nikan , nangnuk , manjusiri , daicing , batma de duite hahai jušen tokso emte , juwanta hahai nikan tokso emte , mendu dagan de ilata hahai jušen tokso emte , juwanta hahai nikan tokso emte.^{[10]908-909[14]4册228}赏恩格德尔额驸、莽古尔岱七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二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二处,近身听差之诸申各五对,取水砍柴之汉人各五对。赏给囊努克、满珠西里、岱青、巴特玛四男丁诸申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赏给门图达汉三男丁之诸申庄子各一处,十男丁之汉人庄子各一处。^{[8]588}

两条史料均载努尔哈赤赏赐额驸、格格、有功之臣的事实,jušen tokso “诸申庄”与 nikan tokso “汉人庄”一一对应,且数量相同。

转至天命十年(1625年),庄与庄头的有关记载越来越明晰。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攻下辽沈,下令甄别汉人,对不从者和读书人进行大规模屠杀,其他人则编入庄园从事生产。后金政权编设庄园行为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活动,见于《满文老档》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四日的三条记载^②:

emu tokso de juwan ilan haha , nadan ihan i banjibu , jangturi (《满文原档》为 juwangturi ,下文同) ahūn deo be juwan ilan haha i ton de dosimbu , jangturi (juwangturi) beyebe simiyan de gajifi , nirui ejen i booi adame tebu , juwe jangturi (juwangturi) boo be emu bade tebu , aika baita oci , tere juwe jangturi (juwangturi) jurceme idu banjifi genefi bošokini , jušen ume dara , jangturi (juwangturi) gebu , tokso i juwan juwe haha i gebu , ihan eihen i boco be , gemu bithe arafi gašan i janggin de afabu , genehe amban bithe arafi gajime jio.^{[11]990[14]4册327-328}一庄编设男丁十三人、牛七头。庄头兄弟计入十三男丁之数内。将庄头带来沈阳,陪住于牛录额真之家,二庄头之家住于一处。有事,则令二庄头轮番值班前往催办,诸申勿管之。庄头之名、庄内十二男丁之名及牛、驴毛色皆缮清单,交该屯章京,然后由前往之大臣造册带来。^{[8]644}

gemu han , beise i tokso arambi , emu tokso de juwan ilan haha , nadan ihan , tanggū cimari usin bumbi , orin cimari alban ningge , jakūnju cimari suweni beyei jeterengge.^{[11]993[14]4册332}故皆建为汗与贝勒之庄屯,一庄给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垧,二十垧为官田,八十垧供尔等食用。^{[8]646}

jakūn gūsai ambasa golo dendefi genefi , gašan pu tome ebunefi waha , wame wajifi ilgafi ujihengge be , juwan ilan haha , nadan ihan be emu tokso arafi , dzung bing guwan ci fusihūn , beiguwan ci wesihun , emu beiguwan de emte tokso buhe.^{[11]994[14]4册333}八旗大臣分路前往,下于各屯堡杀之。杀完后甄别之,当养者,以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给一庄。^{[8]646}

① 《御制清文鉴》:jušen manju aha be jušen sembi。geli jušen halangga niyalma seme gisurembi,自译:诸申,把满洲阿哈(奴才)称为诸申。再,谓诸申氏之人。

② 前文已载有 tokso arambi,以及八贝勒之 booi tokso 史料,参见《满文原档》第4册,第325—326页。

综合这三段内容,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三。其一,编入拖克索的人丁,都是被后金征服的辽东地区的汉人,是在大规模屠杀之后的幸存者。按照当时满洲统治者的观念,他们是所有归附于后金国的各色人等中身份最为低贱的人,这与前面提到的李民奂所说“奴婢耕作,以输其主”一脉相承。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拖克索是农奴制庄园,壮丁身份是奴隶或农奴,是有道理的。《大清会典》称“顺治初年奏准,有罪之家所籍入之奴仆,均拨给各庄以充庄丁”。^①可知,直到清军入关之后,这种作法仍在延续。

其二,每个拖克索虽然仅有13名人丁,却由三种人构成,一是庄头。庄头与其他人丁一样都是生产者,但从上述谕令中看,却不都是屠杀之后所余的汉人,而是后金国的征服者从故地带来沈阳的所谓“旧人”,他们陪住于牛录额真之家,有事则奉命前往督办,是受到主人信任倚重的人物。而“诸申勿管之”一句,又将他们与诸申(即后来的正身旗人,亦即自由民)区分开来。庄头的这种又被主子亲近信任又低下的地位,其实一直沿袭到入关以后。二是庄头的兄弟,“庄头兄弟计入十三男丁之数内”,即日后所称的“亲丁”。第三则是壮丁。

其三,这次大规模编立的拖克索,主要分配给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官员。这种分配方式,与八旗组织紧密相关。八旗的建立以编设人丁为前提,汗王、贝勒的实力都以占有的人丁的多少来衡量,庄的建立如是。在当时辽东一带“地窄人稀,贡赋极少”^[15]的条件之下,谁占有的人丁多,谁能广设庄屯。人丁即劳动力的占有,比地亩的占有更重要。这不仅适用于汗与贝勒,还延续至“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的官员。占有的庄屯数量多寡,取决于庄屯归属的主人。从日本学者周藤吉之《清朝入关前旗地的发展》一文的考证来看,当时的庄屯有壮丁十人、牛四头者,有壮丁十人、牛六头者,也有廿丁、十三丁、十丁、七丁、三丁者不等,他解释为壮丁与牛只的数目在当时并没有作硬性规定,而是随地理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增减。而我们毋宁认为,这是当时许多庄屯的人丁凑不足额的结果,因为所谓一庄有廿丁的情况是极个别的。

崇德年间作为人质居住于沈阳的朝鲜太子李□□的叙述,也可为我们的这一推断提供佐证。

沈阳乃是大野,而北行二十里则有山……所经之处,人居绝稀,间有诸王设庄,相距或十里或二十里。庄有大小,大不过数十家,小不满八九家,而多是汉人及吾东被掳者。大率荒野,辟土不多……各屯设有庄头一人,督促壮丁耕作。^[16]

对于拖克索来说,最重要的是劳动力而非地亩,所以,对人丁的严格控制成为头等重要之事。上引文第一段称“庄头之名,庄内十二男丁之名及牛、驴毛色皆缮清单,交该屯章京,然后由前往之大臣造册带来。”可知庄头与壮丁必须在官府有关机构登记注册的作法,早在天命年间已经实行。

这种依据自己占有的人丁多少而编立庄屯的作法,构成八旗制度下庄园的一大特点,即:从汗(皇帝)、贝勒(宗室王公)以及官员,其拥有的庄屯之数,最初并不是由国家统一规定和分配的,在管理上虽然都采用“拖克索”的形式,但也具有各自独立、各行其事的特点,这一特点直接影响到入关后皇庄、王庄以及官员庄园的性质。具体地说,直到入关之后,皇室的庄园仍归皇室私有,入内务府而不入外八旗;王府庄园下的庄头与壮丁则归王府管理,既不入内务府也不入国家版籍。这正是后人述及清代各种庄园时呈现出来的“乱象”,它往往成为误解、混淆产生的原因之一。以上几个特点,正是清代“庄”的基本特征,并且一直相沿不替,直至清入关之后。

作为半渔猎、半农耕族群,女真人的农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tokso为满语固有词,直接说明tokso是女真社会自己产生的社会组织。从制度结构来看,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tokso产生以前,牛录制度确定之时即有gašan bošokū的设置,牛录系统下的农业成分——tokso的脉络应来源于这条线索。这样的农业机制、农业思维,保持到入关之后,进入京畿这样一个区域。大规模圈占土地,于满洲统治者来说并非突如其来,相反则显得顺乎其然。

^① 乾隆《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60《内务府·会计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3页)。

参考文献:

- [1] 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M]. 唐晓峰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 [2] 宋濂. 元史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3458.
- [3] 八旗通志(初集) [M].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 [4] 邱源媛. 清代直隶旗地的数量与分布考实 [J]. 满语研究, 2020 (2).
- [5] 赵令志. 清前期八旗土地制度研究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13-22.
- [6] 申忠一. 建州纪程图记 [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 [7] 李民奂. 建州闻见录 [M]. 沈阳: 辽宁大学历史系, 1979: 43.
- [8] 满文老档 [M].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 [9] 满文老档(太祖 1) [M]. 满文老档研究会. 东京: 东洋文库, 1955.
- [10] 满文老档(太祖 2) [M]. 满文老档研究会. 东京: 东洋文库, 1956.
- [11] 满文老档(太祖 3) [M]. 满文老档研究会. 东京: 东洋文库, 1958.
- [12] 满文老档(太宗 1) [M]. 满文老档研究会. 东京: 东洋文库, 1959.
- [13] 满文老档(太宗 2) [M]. 满文老档研究会. 东京: 东洋文库, 1963.
- [14] 满文原档(第 1 册) [M]. 冯明珠. 台北: 台北故宫博物院, 2006.
- [15] 清入关前史料汇编(第二辑)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12.
- [16] 辽海丛书(第四辑) [M]. 沈阳: 辽沈书社, 1986: 19.

Farming organization before entry: Tokso

QIU Yuan-yuan

(The Institution of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study of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and banner group, farming people and society was a relatively weak field. As a semi-fishing and hunting, semi-farming people, the attitude of the Jurchen people to the land wa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Mongolian nomad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many Jurchen tribes scattered in Songhua River and Heilongjiang gradually moved to the south, and had increasingly frequent and close contacts with agricultural areas such as Ming Dynasty and Korea, and the proportion of agricultural cultivation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Among them,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Jianzhou Nuzhen had a greater impact on its social structure. The Manchu historical profiles recorded the tokso farming organization “Zhuang” in Jianzhou Nuzhen in late Jin period, showing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eight banner system.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okso directly determined the basic nature of Huangzhuang, Wangzhuang, eight banners, eight banne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farming population. Looking back to tokso in late Jin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ight banner manor system after entering the Shanhaiguan.

Key words: late Jin Dynasty; Jurchen;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Tokso; the eight banners